

张焕君 著

礼记

先秦儒家礼学的
形成与特征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制礼作乐

先秦儒家礼学的形成与特征

张焕君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制礼作乐——先秦儒家礼学的形成与特征/张焕君著.
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0. 1
ISBN 978-7-5004-8403-5

I. ①制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儒家—礼仪—研究—
中国—先秦时代 IV. ①K892.9②B22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3669 号

责任编辑 史慕鸿
责任校对 韩天炜
封面设计 毛国宣
技术编辑 李 建

出版发行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-84029450 (邮购)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9.5 插 页 2

字 数 212 千字

定 价 25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内容提要

传统中国号称礼义之邦，传统文明也常被称为礼乐文明，礼是理解传统社会的关键词。无论是学术层面上的礼学，还是实践层面上的礼制，都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与时迁移，因以损益的。周公制礼作乐，强调人间的德行，主张明德慎罚、敬天保民，并使这种思路体现在周初施行的种种制度上。孔子仰慕周公，又将礼与仁、义结合，并通过诗、书、礼、乐的形式表现出来，在使儒家礼学具备中正刚健的特征同时，礼成为一种人人皆须面对并生活于其中的人间秩序，而知书达礼的君子也成为中国人心向往之的人间典范。下及儒门后学，在长期关于经与权、常与变的讨论与实践，礼学逐渐形成完整的体系，成为传统中国固定的价值核心。可以说，儒家礼学始终关注的是对人世生活的合理安排，而这种关注又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，从而在思想、制度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，对这种关系的探讨，不仅有助于理解儒家礼学的形成，而且对文化转型时期如何实现儒家思想的合理转化也不无启示。

作者简介

张焕君，男，生于1972年，山西灵丘人。先后在山西、北京求学，200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，获专门史博士学位。随后在该校哲学系做博士后研究，2008年1月出站。现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。主要研究方向是礼学史、思想史。于中国古代历史中，尤其钟情于魏晋与先秦，以为乱世中人心不齐，却最容易看见真性情。信仰生生不息之道，认为学问就在日常中。发表过一些不成熟的见解，颇不以为意。

装帧设计 / 毛国宣

目 录

导论	(1)
第一节 传统与现实的对接	(2)
第二节 礼乐教化	(18)
第三节 写作思路和章节安排	(42)
第一章 殷周革命与周公制礼作乐	(53)
第一节 股肱周室,辅翼成王	(56)
一 周公东征	(58)
二 营建成周与迁移殷民	(60)
三 封建侯卫	(63)
第二节 制礼作乐	(70)
一 革命与民主	(72)
二 德与刑的叠奏曲	(78)
三 制礼作乐	(84)
第三节 礼仪之邦	(95)
一 宗法的温情	(97)

二 礼达而分定·····	(105)
第二章 礼制与礼学 ·····	(123)
第一节 崩坏还是转型·····	(125)
一 天地一大变局·····	(126)
二 崩坏与维持·····	(130)
三 战国风度·····	(143)
第二节 孔子的礼学·····	(147)
一 仁与礼·····	(149)
二 养成人格的成人之道·····	(163)
第三节 儒家后学的礼学发展·····	(175)
一 礼学体系的构建·····	(180)
二 孝道·····	(192)
第三章 常礼与变礼 ·····	(201)
第一节 冠婚·····	(202)
一 冠礼:成年与成人·····	(206)
二 婚礼:敬慎重正而后亲之·····	(212)
第二节 丧祭·····	(224)
一 丧礼:立中制节·····	(225)
二 祭礼:自中出,生于心·····	(244)
第三节 变礼·····	(257)
一 礼经已有但说法不同·····	(260)
二 礼经所无而制作弥缝·····	(264)
结束语 ·····	(275)

参考文献·····	(283)
-----------	-------

后记·····	(297)
---------	-------

导 论

在 20 世纪之前的中国，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着正统的地位，其对传统中国的巨大影响无可置疑，但进入 20 世纪之后却是命运多舛，屡遭打击，而最近十几年几乎成为可与“西学”比肩的显学，受到普遍的关注。这种关注既来自学术界的各种专题研究，也有来自官方、民间的宣扬提倡，而无论是哪一方，无论是正规的学术研究还是非学术评说，无论态度是揶揄、批判还是赞扬，一个共同之处就是：生长于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儒家思想，在以城市化、现代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里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？或者说，儒家思想创立之初的现世关怀能否延展并适用于当下的生活？如果不是对这种疑问作简单的价值评判，而是能够回到儒家思想发生的语境之中，辨别源流，细心体察，考察其思想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，或许能够在众说纷纭的喧闹中，找到一些古今联系的通路。如果能进一步由细节进入本体内部的精神，或许更能看到古今社会的很多共同之处，无论是对人心的评判还是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，就会发现就其大端而言，古今并无不同。

第一节 传统与现实的对接

自孔子而下，经过子夏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、荀子等弟子后学的扩充与推广，儒家成为先秦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学术门派之一。西汉之后，再经董仲舒等人的改造、丰富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主流思想，对古代中国人的观念、生活、行为、习惯影响巨大而深远。进入 20 世纪，这种持续两千年之久的影响被逐渐打破，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西方移植过来的观念、制度、法律。直到今天，这种打破活动仍然未获全功，仍在继续进行。

想来也觉奇怪。20 世纪的中国，思想也同政坛，走马换将，风起云涌，极为动荡。但无论怎样调换，在当时最为先进的中国人头脑中，都已经普遍接受了西风压倒东风的事实。洋人的坚船利炮不需要再耗神费力地去跨海翻江，来耀武扬威，洋人的政治制度、宗教信仰乃至民主观念、卫生习惯，都日渐成为努力效仿的标准，唯欲其速，唯恐其迟。支撑此般事实的宏大理由是救亡图存的焦虑，富国强种的迫切，一切都显得正当而合理。睁开的眼睛一旦见到影影绰绰的光明世界，当初的黑暗就变得无比丑陋压抑，绝难忍受。于是，两千年的中国政治不可避免地成为“秦政”，是大权独揽、赏罚由己的秦始皇展现独裁的舞台；两千年的思想观念尽成“荀学”，是为了迎合专制者炮制出来的奴才思想；儒家成为“孔家店”，儒学成了统治者虐政愚民的帮凶，神道设教的渊源，礼仪之邦竟是哀鸿遍野，礼乐教化竟成“吃人”工具。矫枉必过正，正本还清源。于是，在一波接一波

的呐喊声中，儒学终于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总根源，承担起近代中国所以落后挨打的最终责任。相应地，在毅然走出旧家庭寻求新幸福的青年眼中，除了对新世界的向往，充满内心的是对旧礼教的愤恨。而且令人诧异的是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新世界的婚姻自主、男女平等以及极为流行的个人自由，与反对家庭画上等号。尽管，美妙的新世界还在虚幻之中，而黑暗的旧家族却需要活生生地奋力摆脱。

时至今日，这样的勇气仍能令后来者感佩不已，五四先驱陈独秀关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名言更是耳熟能详。他比较中外社会，认定中国必须目标坚定，敢于牺牲，社会才会有进步。他说：“西洋人因为拥护德（Democracy）、赛（Science）两先生，闹了多少事，流了多少血；德、赛两先生才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，引到光明世界。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，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、道德上、学术上、思想上一切的黑暗。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，一切政府的迫压，社会的攻击笑骂，就是断头流血，都不推辞！”具体而言，“要拥护那德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孔教、礼法、贞节、旧伦理、旧政治；要拥护那赛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、旧宗教。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”。^①

德、赛两先生虽然源出西方，是洋人的发明，但因为是人类一切重要领域由黑暗到光明的唯一途径，就具有了普适性，足以引导世界潮流，浩浩向前。在这股潮流中，又有阻碍前行的逆流，那就是所谓“孔教、礼法、贞节”之类的

^① 陈独秀：《本志罪案之答辩书》，《新青年》六卷一号，1919年1月。

“国粹”，以及一切的“旧伦理、旧政治、旧宗教”。为了顺利前行，迎赶世界潮流，必须打倒这些旧东西。尽管陈独秀对中、西，新、旧的概括失之于简单，但我们必须承认，无论是在五四时期，还是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乃至现在，这样的论断都因其立场鲜明而有着极大的影响力。

同为五四健将的胡适更为看重个人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，他说：“社会最大的罪恶，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，不使他自由发展。”又说：“现在有人对你们说：‘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！’我对你们说：‘争你们个人的自由，便是为国家争自由！争你们自己的人格，便是为国家争人格！’自由平等的国家，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。”^①而无论是自由还是个人人格，在中国都是最为缺乏的，就像鲁迅在《灯下漫笔》中指出的，“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‘人’的价格，至多不过是奴隶，到现在还如此，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，却是数见不鲜的”。正因为缺少人格，所以“中国人无论如何奋斗，其结果无非是两个位置：想做奴隶而不得，或暂时做稳了奴隶”。^②而这样的社会背景，在五先贤看来，都是渊源有自，历久弥新的。为此，必须义无反顾地反对一切旧道德、旧伦理，因为“伦理之觉悟，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”。^③而所谓旧道德、旧伦理，无不集中于儒学一身。儒学被否定，被推翻的最终命运，也就

① 《介绍自己的思想》，《新月》第三卷四号，1931 年 6 月。

② 鲁迅：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，第 212 页。

③ 陈独秀：《吾人最后之觉悟》，《青年杂志》一卷六号，1916 年 2 月 15 日。

可想而知。^①

如果说，五四先贤的鼓舞号召大多还是停留在口中演讲和笔下文章中，其接受者也大多是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，那么 1949 年后儒学面临的处境与此又有很大不同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模式，犀利的阶级分析手段，以工农大众为主的文化目标，以及强大的动员力量，对领袖的无限忠诚，都是前人无可比拟的。从批判电影《武训传》开始，旧道德再次被放到审判席上，其后的历次运动，都难以置身事外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后，无论是旧政治，还是旧道德、旧伦理，在一次次的口诛笔伐、狠斗深挖中，被全国人民一次次地理论联系实际、一次次地连根掘起，踩在脚下。妄图“克己复礼”的昔日圣人被“还原”成“孔老二”，不仅成了几十万“臭老九”的领班，唯心主义的代表，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，而且还是当年的革命接班人后来的叛党叛国者林彪的精神导师。在中国，历来不乏学术结合政治的例证，但像这样能够古今一体活学活用的水乳交融却也并不多见。

然而，所谓怪异正在于此。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，国学热开始升温，从最初个别学者的研究开始，逐渐有了专门的国学刊物，进而有了专门的国学研究机构。对国学的认可，逐渐超出学者的范围，政府进来了，于是山东曲阜的祭孔大典可以频频见到各级官员的庄重身影，世界各国可以常常听到孔子学院成立的最新报道；民间活跃了，于是各地有了设计、穿戴古代“汉族”衣冠的“哈汉”一族，学校开始举办源于儒家冠礼的成年礼，现代私塾重现闹市，小学生纷纷

① 陈独秀：《吾人最后之觉悟》，《青年杂志》一卷六号，1916 年 2 月 15 日。

“读经”，《三字经》、《弟子规》甚至四书五经都成为启蒙读物；《百家讲坛》火了，于丹的《论语心得》成为几百万现代都市人安抚焦灼心情的“心灵鸡汤”，各路英雄纷纷出马效仿，孔子几乎成了“大众情人”、“知心姐姐”。先贤们的奔走呼号，七八十年的严厉批判，领袖的高瞻远瞩，政治运动的深入肌髓，似乎都未曾发生过，当年遭人痛打的流浪狗，抖擞精神又成了雄姿英发的“金毛狮王”，惹得万众瞩目。这样的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，沧海倏尔变桑田，虽然在自然界并不罕见，但在人类这样以理性自诩的种群中，终究显得反复无常，难以捉摸。不胜诧异，也就在情理之中。

于是，赞叹者有之，批判者有之，疑惑者亦有之。赞叹的是儒学超强的生命力，不管儒学是否也被叫做国学、国粹，还是荀学、旧学、孔孟之道，不管这两千多年间经历过多少损益改造，只要看看近百年来坎坷命运，屡屡批而不倒，打而不死，不管这批判的力量是来自知识阶层，还是国家政权、草根群众，它总能积蓄力量，再次崛起。其中原因何在？能不引人深思？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有被人称作新儒家的一批大师，如熊十力、梁漱溟、冯友兰，就对儒家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作了深入的分析，力图找出其中原由，确定儒家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。50年代之后，海外又有牟宗三、唐君毅、徐复观、杜维明诸先生继踵其后，对儒家的内圣之学多方探讨，硕果颇丰。这种趋势在90年代之后，又有不同，赞叹者不仅局限于知识阶层中的少数学者，更多的学者甚至普通民众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的交互影响下，开始将儒家思想与个人生活乃至民族定位联系在一起。大家意识到，无论在价值层面对儒家作出怎样的评价，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：它曾经是中国人两千年来最重要

的思想资源，曾经是无数仁人志士的精神力量来源，而且也是许多流传到今日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思维方式、行为习惯的源头。这样的事实，无法改变，实际上也无须改变，因为它已经是现代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胎记、遗传基因。彻底的清除，带来的只能是自我的毁灭。因此，赞叹者极为认同“民族的就是世界的”这样的口号，力图以这样的文化符号区别于他者，尤其是欧美等西方文明国家，从而达到强调自身独特性的目的。

同时，市场化的日渐深入又加强了这种有意识的强调。三十年的改革开放，不仅带来了经济的腾飞，也引发出许多现代社会常见的弊病：过于强调自我、突出个性，有权利，无责任，人际淡漠，欲望强烈，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然而，大家惊喜地发现，儒家学说中似乎正有祛病的良方，儒家重视群体，强调谦让，推崇个人对家族、社会、国家的责任，既有内在的修身之道，又不乏外在的践履之途，而这一切恰恰是现代社会中所缺少的。所以，北京师大于丹教授在《百家讲坛》讲授并不惊心动魄也没有曲折故事情节的《论语》，竟能让几百万人为之倾倒，争相解囊，一时蔚为文化奇观；而全国各地由民间人士办起的各类私塾学堂，尽管教授的也只是几百年前的知识，但因为学习者知识增长之外更有做人之道的领会与实践，不仅懂得，而且做得，就使此事更受认可，发展也更为迅速。儒家历来有内圣外王之道，《大学》开篇即云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，此为内圣之学的三纲领，如何践履则有具体的八条目：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由内而外，由己及人，不空谈，不辞费，件件可到实处。后来的新儒家之所以范围局限，收效甚微，常被指责只

重内圣，忽略外王，截断内外联系，心性之学遂成玄学清谈，无法落地生根。正因如此，赞叹者面对这样的局势才格外惊喜，认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切实举动不仅显示了儒家学说的绵延不绝，更是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体现。

同样的局势，在批判者看来全然不同，甚至可谓遗毒甚深，祸国殃民，其言辞之激烈，态度之决绝，较之赞叹者犹胜一筹。批判者的阵营并不统一，出发点也各不相同，但在强调现代性上却极为一致，而这种现代性，大体可以概括为西学为尊、西化为主、进化有序、倒退有罪这样几个特征。其中，一部分号称新“左派”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，他们认为孔子既然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，其思想又长期成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，为统治者服务，在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发展高级阶段，自然毫无用处，对其学说中的腐朽落后甚至提倡倒退的思想，更应该大张旗鼓地加以批判，毫不容情。对当前社会上出现的种种“复古”现象，也应该通过种种有效手段，加以制止，不可任其发展。

另外一些自觉继承五四遗志的批判者，则再次挥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，认为在孔孟之道中，有君主无民主，有人治无法治，有等级无平等，有愚昧无科学。儒学产生的基础是所谓农本经济，维护小生产的生活方式，强调“安贫乐道”，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这种经济态度反映在国家政策上，就是“重本抑末”、“重农轻商”的经济政策。而正是这种观念，遏制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步伐，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，甚至到了改革开放以后，其负面作用仍未完全消退。可以说，这样的农本经济是与现代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，应该坚决废弃。就政治而言，其危害性对现代民主制度危害更大。儒家提倡皇权，维护专制，毫无民主

可言。唐代大儒韩愈在其著名文章《原道》中就赤裸裸地说：“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则失其所以为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，则失其所以为臣；民不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事其上，则诛。”^① 君主的职责就是高高在上，统治万民；民众的职责就是从事农、工、商业，缴税纳捐，接受统治；处于其间的是众多官员，执行君主制定的政策法令，督促民众履行义务。这样的政治体系中，哪里看得到一丝半点的民主性？不仅如此，儒家还炮制了所谓“三纲五常”，从道德伦理等精神层面控制民众，为统治者服务，以致形成了“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叫子亡，子不得不亡”这样的荒谬理论，又哪里有什么平等观念、契约精神？孔子轻视妇女，认为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，后世更是变本加厉，三从四德之外，又提倡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剥夺女性接受教育、平等交往等多种权利，宋明之后，更极端强调“从一而终”的贞节观，导致无数妇女身心禁锢，遗恨终生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逝者已矣，略可不究，但在中国全力推进民主、法治的进程中，却又提倡国故，沉渣泛起，危害国人，其居心何其不善，其用心何其歹毒！职此之故，批判者多以民主卫士、自由标兵自任，号召民众擦亮眼睛，不要盲目跟风，助纣为虐。其态度激烈者，甚至扬言中国社会需要再来一次“焚书坑儒”，斩草除根，方是干净。

处于赞叹者与批判者之间的是疑惑者。因其态度不够鲜

^① 赵德编，刘真伦辑校：《昌黎文录辑校》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62页。